

民主理论研究的转向与启示

何家丞

摘要 二战后西方民主理论主要包括作为“政治工程”的捍卫本国政治制度的护卫性民主理论、比较政治中的民主转型学，以及作为“学术工程”的历史社会学中的民主理论。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主理论研究缺乏议程设置的能力，将西方的“政治工程”当作“学术工程”，表现为把西方的护卫性民主理论研究当成思想史上的经典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与西方民主转型研究亦步亦趋，缺乏优质的案例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研究。民主理论研究的历史转向凸显了学者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并给予中国的民主理论研究以启示，其中最大者是呼唤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以民主为中心的政体论政治学转向以治理为中心的比较政治研究以发现真正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 民主理论 护卫性民主理论 民主转型 历史社会学

作者何家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1-0087-08

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民主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断地被建构和解构。二战以后，现代化研究（包括民主）和民主化问题更是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显学。总的来说，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护卫性的民主理论研究到比较政治中的民主转型研究，再到历史社会学中的民主研究的转向。本文无意全面概括和点评民主理论的各家论述，而是从整体上把握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趋势及其给予国内民主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一、基于本国政治的护卫性民主理论

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改造民主与合法性概念，民主从一个理想主义的批判性概念蜕变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护卫性概念，是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这种以本国政治为基础的护卫性民主理论旨在证明，世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冲击下的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民主的，其开创者是约瑟夫·熊彼特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熊彼特是民主理论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转型的代表人物，其提出的竞争性选举理论指引了西方 20 世纪民主理论的发展^①；在此基础上，李普塞特改造了合法性理论，证成了熊彼特式民主的合法性。这一连续性的理论“重述”过程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性影响。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基础上通过两个步骤构建了新的民主理论。首先，他对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解构。其次，在解构“古典民主”概念的基础上，熊彼特以现行的

^① 参见陈炳辉：《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江淮论坛》2013 年第 5 期。

西方代议制民主为模板建构了一个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以精英主义为指向的经验主义的“民主”概念。^①

熊彼特认为“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②接下来他便抽丝剥茧地论证古典民主的不可能性：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合理论证的共同福利；其次，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也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再次，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将烟消云散，因为它必须以明确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因此，古典民主学说的两根支柱，即“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③

在对经典的民主思想进行釜底抽薪式批判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定义。“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换言之，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观点，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同时我们规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④熊彼特是一位经济学家，难以避免地以经济眼光看政治问题，把政治家看成企业家，这从他所提出的崇尚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在经济生活中，竞争从不完全停止，但很少是完全的。同样，在政治生活中，总有某种争取人民忠诚的竞争，虽然也许只是潜在的竞争。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说明民主政体的争取领导权的竞争只限于自由投票的自由竞争。这样做的理由是，民主政体看来是指导竞争的公认方法，而选举方法实际上是任何规模社会唯一可行的方法。”^⑤这种倾向把市场模式从经济领域移植到政治领域，初步构建了一个政治市场模式。

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主体制的现状性分析，最终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熊彼特将民主理论从关注“目的与价值”转移到了“功能与程序”，认为民主只是政治方法，是为了实现其他的价值。然而，熊彼特自身却可能携带价值倾向，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现实崇拜”，以现实政治为参考系，努力使现状合理化，即“竞争领导地位的理论已经证明是对民主过程一些事实的令人满意的解释”。^⑥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熊彼特“力图发展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民主模式……他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性的：说明实际的民主是如何运行的。他想创造一种理论，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理论远比现有的模式‘接近生活的真实’……他的民主理论既集中关注一系列特别具体的问题，又维护一系列关于‘民治’政府合适形式的特定信条。这些信条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表面的一致性”。^⑦

熊彼特基于本国现实政治对民主概念进行的改造是否具有合理性？李普塞特对该问题进行了重要的理论补充。首先，李普塞特肯定了熊彼特提出的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并在其中嵌入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一个复杂社会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中作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这个定义……隐含着如下几个特定条件：（1）有这样一种‘政治信条’或政治信仰体系：认为通过政党、新闻自由等方式表达信仰是合法（公认正当）的；（2）有一组执政的政治领导人；（3）有一组或多组希图执政并得到承认的领导人。”^⑧

随后，李普塞特开始论证这种民主的合法性。他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

① 参见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②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0页。

③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72—373页。

④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95—396页。

⑤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97—398页。

⑥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414页。

⑦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⑧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①因此，作为一种评价性的概念，合法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取决于制度对社会结构的适应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契合程度。“组织是根据政治系统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它是否合法……在产业主义出现之前，封建社会无疑享有它的大多数成员的效忠。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是一种晚近的历史现象，这是紧跟着一些团体间出现尖锐分歧而发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团体可以围绕不同的价值标准组建，而以前认为，可接受的价值观是唯一的……当代民主政治系统的合法程度，主要取决于解决造成社会历史性分裂的关键问题的途径。”^②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能解决这种历史性分裂呢？李普塞特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认为“投票是民主社会中达成共识的关键机制”。^③在合法性概念的“立法者”韦伯那里，合法性是指官僚制政府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李普塞特则以选举式民主置换掉合法律性，认为投票选举产生的并有效统治的政府就是合法性政府。^④也就是说，以美国为代表的允许权力和平“竞赛”的竞争性民主体制无疑具有合法性。

在熊彼特和李普塞特进行开创性理论研究之后，乔万尼·萨托利和罗伯特·达尔等人进一步完善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如果说熊彼特着重阐述了自由主义民主中的选举维度，那么萨托利则进一步在价值和程序的多个面向中系统论述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萨托利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清理”工作，其主要目的是确立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主流地位，为自由主义民主体制辩护。他自称《民主新论》是“一部论述主流基础的著作”，其目的就在于为自由主义民主提供生存和被理解的理由，以增强其生命力，一方面应对自由主义民主遭遇的理论冲击，另一方面唤起民众对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认同。达尔则坦率地表示，“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民主就是必须实际地保证每个成年公民都由参与投票的权利”。^⑤

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终于完成了护卫性民主理论的论说工作，并适时地将捍卫西方制度的民主理论推广出去，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

二、比较政治中的民主转型学

产生空前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严重挫折，世界并没有如现代化者想象的那样“百川归海”，走上符合美国理想的发展道路。虽然现代化理论被送进了历史的坟墓，但是却迎来了意识形态角逐的接力者——民主化理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深刻影响了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民主研究，二战以后的主流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认定选举是民主的本质。^⑥

具有开创性的民主转型研究是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和劳伦斯·怀特海合编的四卷本丛书《威权统治的转型：民主的前景》。在第四卷《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尽管作者的态度是审慎的，将“转型”定义为“在一个制度与另一个之间的过渡期……一方面，转型是以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而启动的，在另一方面则是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或者是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⑦，但是其关注的核心主题依然是自由化、民主化以及二者的互动过程。在转型范式的笼罩下，诸多学者在世界、地区、国别等多个层次的民主化研究中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世界性民主转型。研究世界性民主转型的代表是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沿袭了熊彼特对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⑧，他的创新之处是基于宏观的历史视野，将民主转型的浪潮即“一波民主化”界

①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47页。

② 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47页。

③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8页。

④ 参见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⑤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⑥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4, 1997, pp. 6-7.

⑦ 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景威、柴绍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⑧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页。

定为“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①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解释 1974—1990 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对于第三波民主化为何出现，亨廷顿给出了五项解释：合法性危机、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变化、外部行动者的政策变化和“滚雪球”效应。他的解释讲求两个原则。首先是关注时空的差异性，他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原因的相对重要性因地区、威权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以及所处的时间位置而有所不同。^②这种差异性情况在区域国别的民主转型研究中体现得更加生动和具体。其次是同时关注结构与能动因素，社会条件和精英抉择都很重要。“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一些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第三波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③简言之，“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④

地区性民主转型。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则是研究地区性民主转型的代表作。与之前集中于南欧和南美的民主转型研究相比，该著将后共产主义欧洲纳入研究视野，同时将民主理论研究的重心延伸至民主巩固的相关问题。在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基础上，林茨等人认为“民主化要求开放关于政府控制权的辩论，接着便是要求进行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由选举结果决定谁来进行统治”。^⑤这无疑是熊彼特式的民主定义。而“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⑥他们在关注影响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重要变量时，与亨廷顿一样同时关注了结构因素和能动因素，试图发展出有助于解释不同类型民主转型与不同方式民主的巩固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宏观上的“国家性”和初始政体类型，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关注先前非民主政体的领导基础与启动和控制民主转型的行动者，情境变量则涉及国际影响、高压政治的合法性以及立宪环境。

其中，该著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是对国家性的关注。在分析国家性时，作者强调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学常识，分别是国家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国家性与民主的关系。“民主需要国家的地位。没有主权国家，不可能有可靠的民主制度。”“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优先于民主制度的创建。”^⑦那么国家性究竟指向哪些方面？它涉及关于国家领土范围的共识和国家之内公民权的共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多民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和认同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再次凸显了时间性的考量：“如果转型的起点是非民主的多民族联邦制度，建立民主的联邦制的一种策略，在选举的次序上可能应该首先在国家层次进行选举，这样可以产生一个合法的框架，然后再仔细考虑如何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分权。如果首先进行区域性的竞争性选举，那么选举可能会助长区域性的民族主义，出现的可能是一族统治而不是民主。”^⑧事实上，作者关注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民主化的关系，其国家性概念仍有非常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和开展案例研究的价值。

国别性民主转型。对民主转型的国别性研究往往是世界性和区域性研究的基础。自葡萄牙、西班牙开

①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 12—14 页。

②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 119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 120—121 页。

④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 380 页。

⑤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 页。

⑥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 3 页。

⑦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 20、27 页。

⑧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 35 页。

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以来，南欧、拉美、东欧等地区的国家先后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研究层出不穷。前述《威权统治的转型：民主的前景》和《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便是以十几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研究为基础的。

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思潮通过观念赋予行动正当性，以此牵引着历史发展的方向。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巨大能量，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现实政治的变化。民主转型学关注精英和公民社会中利益集团的自由竞争，以期实现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制度均衡。但是，竞争性选举能够无视社会结构的制约而实现制度化吗？强调自由竞争的民主理论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政治上的“善”吗？事实是，西式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了其巨大破坏力，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日趋恶化的现状是对美国民主输出的强力讽刺。^①而在殖民时期便开始经营自由民主体制的菲律宾，也深陷暴力和腐败的泥淖，民主制度被非正式的权力结构所主导，形成了变异的“封建制民主”。^②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张力，西方的民主理论家曾经试图修正“选举主义的谬误”或“自由选举的陷阱”。亨廷顿认为对选举的失望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非西方国家的选举结果与西方社会不同。非西方社会的选举既可能导致严重威胁民主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的胜利，也常常诱使政治家提出最能为其赢得选票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③诡异的是，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了美国，特朗普上台就是种族主义政治的表现。亨廷顿的修正没有从根源上意识到自由主义民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问题。在美国，曾经保障选举式民主正常化的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美国出现的国民性危机，必然带来选举式民主的非预期结果。

三、历史社会学中的民主理论

如果说护卫性民主理论和民主转型学是“政治工程”，那么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民主理论研究则是寻求事物真相的“学术工程”，把民主置于历史进程去发现。与受到自由民主理论戕害和国家利益驱使的比较政治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民主研究则保留并传承下被前者遗失的历史取向。比较政治中虽然有部分的历史社会学作品，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当前兴起的对于自由民主理论的历史性反思，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转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传统的复兴。它与基于本国政治的护卫性理论是存在内在张力的。

部分学者认为，欧洲的民主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与当代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暴力和苦难没有共同之处，同时它也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领域，很难再提出新见解和新主张，因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19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发展上，而将欧洲民主史排除在民主起源和前景的辩论之外。^④但是，如果我们重读历史社会学取向的民主理论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民主化历史绝非与暴力无缘。相反，在最具代表性的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和迈克尔·曼的作品中，西方的民主史可谓是一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暴力史。

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概括出了三条通向民主世界的道路，其中最早的一条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在经过一系列革命之后相结合的道路。^⑤对于这条道路，摩尔在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有必要用资产阶级革命来指称某些特定的暴力性变革，这些变革发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化现代民主社会的进程中，被历史学家们等同于清教徒革命（或者人们通常所称的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和

① 参见李翠亭：《“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兼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② 参见何家丞：《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③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4, 1997, pp. 7-9.

④ 参见 Giovanni Capoccia and Daniel Ziblatt, “The Historical Turn in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Europe and Bey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8/9, 2010, p. 932.

⑤ 参见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蕾、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美国内战”。^①在随后展开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化道路中，始终笼罩着暴力和革命的阴影。在方法上，摩尔对于暴力的考察是通过阶级分析展开的。他关注农业对各种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关注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农民既是推动革命的机器也是革命的代表，并且在革命机器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之时开始逐步扮演起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历史角色”。^②正是拥有不同力量的农民、地主和资产阶级等社会阶级的联合和冲突，才塑造了历史上不同的民主化道路。摩尔的深刻洞见并没有终结民主起源的讨论，反而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实现了比较历史分析中的“知识积累”。^③

与摩尔关注地主和农民关系的视角不同，蒂利的研究焦点是社会抗争。“民主化意味着增强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之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的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对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的）保护使之免遭政府代理人独裁行为的侵害。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受保护协商的增减，称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为民主。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也不是民主毫厘不差地运作，而是实质性地迈向更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④民主化的实现取决于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这三个场域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互动。^⑤这凸显了暴力和抗争的重要性：正是暴力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信任网络和类属不平等，推动了社会变迁的三个机制——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隔离、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改变公民与政府代理人互动的公共政治的变动，从而促进了民主化。透过对 1650 年以来的欧洲经验的分析，蒂利概括出了四种促进民主的抗争机制：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⑥实际上，蒂利所说的殖民化与曼所说的民主的阴暗面存在紧密联系。

《民主的阴暗面》似乎是充满挑衅意味的，暂且不论其逻辑论证是否严谨、文献材料是否详实和准确，其颇具吸引力的标题便给予我们极大冲击：我们一直呼吁的民主在历史上是否并不光彩？首先，曼非常明确自己的方法论取向，即一种历史的和动态的比较分析。这种过程性的历史关怀恰恰是诸多思想史和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民主研究者所缺乏的，而这也正是接近历史真相的前提。他发现，“在近代殖民地，某些背景下的殖民者民主政体是真正具有谋杀性的，比更为专制的殖民政府还要厉害。殖民者对殖民地机构控制越多，清洗就越具谋杀性……它是在民主政权与大屠杀之间发现的最为直接的关联”。^⑦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他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悲惨故事”，殖民者认为“人民”具有单一的“文明”的性质，不包括“当地人”、野蛮人、东方人等等，“低等种族”不是我们—人民的一部分，欧洲人当中的阶级妥协、代议制统治以及宽容等形成在针对庞大非己团体的可怕暴行之上，在美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出迄今为止可能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清洗。^⑧在第 4 章“新大陆的种族灭绝性民主国家”中，曼通过丰富的史料分析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种族灭绝过程。民主和平理论在殖民地表现并不理想，美国和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民主而非被谋杀的数百万人的民主。谋杀性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是新大陆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关键——先是由殖民者殖民地实施，然后再是独立的“第一批新的民族国家”。^⑨

如果说经典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击碎了西方民主化过程的“完美”形象，那么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则更新了我们接近历史真相的工具。无历史地研究民主化可能会忽视它的曲折性和多样性，因此需要在方法论上

①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前言第 5 页。

②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第 468 页。

③ James Mahoney,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5.

④ 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年，第 13 页。

⑤ 参见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第 8 页。

⑥ 参见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第 21—23 页。

⑦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5 页。

⑧ 参见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第 88 页。

⑨ 参见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第 137 页。在林茨等人对于“国家性”的研究当中已经指出，“如果主体民族确实要建立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各种类型的‘种族清洗’方案往往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方法”。参见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 32 页。

重视历史的时间性分析，关注民主制度形成和变革的重要时刻、民主要素产生的非同步性以及推动和塑造行动者的多重矛盾。^①民主化过程中民主的不同属性并非同时产生，不同制度组合的互动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非同步性政体变迁”（asynchronic regime change）的概念：首先，它可以呈现不同制度场域中不同的制度原则和逻辑；其次，政治体制中共存的政治制度产生的时序往往不同，而且可能具有不同的前因；再次，政治体制中不同的政治制度具有自身的反馈效应，有可能产生与改革预期不同的结果。^②民主研究的历史转向隐含着对于民主化多样过程和结果的探索与接纳，要求我们发展情境敏感取向，尊重过程和要素组合的复杂性。这一研究取向代表了西方的民主研究者重要的自我反思，它没有纳入目的论和进化论的假设，同时也没有内在的倾向为建立在这些假设之上的规范性理论辩解。^③这无疑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关怀。

四、中国的民主理论研究：反思与重建

在改革开放后重建政治学学科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向西方汲取了大量资源，民主理论也不例外。

首先，把西方民主理论家的护卫性研究当成思想史上的经典研究。自由民主政治学的重要基础是自由民主理论，它是由几代自由民主理论家所构筑的。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民主理论研究中，自由民主理论受到了极大关注，诸多中国学者开始研究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大师级人物的民主思想，从总体逻辑到专门维度，从个人思想到比较思想，一时间成果颇丰。但是，研究大师的思想不一定能产出大师级的作品，成果的丰裕也可能代表着思想的贫困。政治学界对于民主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被思想家的文本论述所牵引，竞争性选举的自由民主模式深入人心。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之外的其他民主理论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例如参与式民主理论、共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等，但是部分学者还是陷入了“文本崇拜”的窠臼。民主理论家也是历史语境中的人，难以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些理论的生成都有其实证或者说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但是却被一些研究者做成了纯粹的思想研究，只是转述和诠释这些流派的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并没有深入挖掘其思想背后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即缺乏政治思想研究的语境意识。

究其原因，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这种研究把既有理论当作政治学理论本身或者全部，堪称“理论政治学”，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非历史的、非在地化的象牙塔式的注经运动，从而形成“理论富养”现象。殊不知政治学理论不但来自对既有理论的研讨，更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提炼，而后两者的路径显然比“理论政治学”更加艰辛。历史政治学对于政治学理论的知识增长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可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方面是强化思想解读的历史眼光，理清思想所回答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样才能对思想进行甄别、反思和选择；另一方面是在文明史演进的基础上进行观念的链接，即在历史语境转换的背景中考察思想的流变，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人一题之论述。这样一静一动两个维度对于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中国构建自主的民主理论，对于世界性民主理论也是一种知识增量。

其次，民主转型研究亦步亦趋。与“理论政治学”研究相同，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是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时兴起的，因此比较政治学的民主研究势必将重心放在民主转型学：一方面不断丰富对于民主转型理论的解读，另一方面按照西方设定的民主转型条件去观察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民主理论的注脚。

比较政治研究中民主理论的前进方向是什么？首先或者说是基础的是要认识到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局限性，其次是深化对中国案例本身的解读。第一个方面可以“公民社会”研究为例。西方民主化理论中的一

^① Giovanni Capoccia and Daniel Ziblatt, “The Historical Turn in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Europe and Bey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8/9, 2010, p. 932.

^② Daniel Ziblatt, “How Did Europe Democratize?” *World Politics*, Vol. 58, No. 2, 2006, pp. 311-338.

^③ Maxmilian Strmiska and Jan Prouza, “Turning to History, Appraising Diversity and Recasting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Some Propos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Vol. 25, No. 2, 2017, pp. 255-270.

个重要概念是公民社会，罗伯特·帕特南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①更是让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的观点变得耳熟能详。但是公民社会确实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吗？有学者直言，“市民社会和民主的关系事实上非常复杂，帕特南等人实际上将市民社会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化意味着对市民社会的规范性期望干扰甚至扭曲了对市民社会现实的分析”。^②另一方面，在比较政治中，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是务实的选择，民主理论也应如此。我们需要挣脱西方民主化理论的束缚，重新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最后，缺少真正的、深度的案例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凡是对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有所突破的作品，无一不承载着对于历史的尊重与关怀。既然我们已经找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软肋，即去历史化，那么基于历史的过程分析无疑是重建民主理论的努力方向，从历史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则是我们的重要学科资源。部分西方学者已经从历史社会学路径出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历程进行了考察。但是国内真正以此路径开展民主研究的学者和成果屈指可数，案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拘泥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限制，或者只是即时性的政策分析。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回到摩尔”的命题，呼吁重视民主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比较历史视野。^③随着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学者对于案例分析方法和历史社会学路径已并不陌生。中国的民主研究亟待透过历史社会学的视野重新检视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过程，突破既有的去历史化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束缚。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民主模式的特征凸显了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情境约束。理论只有接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才能衡量出力量；只有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纳入历史的维度，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理论的得失和现实的需求。“中国政治学中的历史社会学刚刚起步。没有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就等于没有历史根基，没有历史经验支撑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坚实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辞藻堆砌。”^④对于民主理论研究而言，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当然它的难度和周期也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Tur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esearch on Democratic Theory

HE Jiacheng

Abstract: Western democratic theories after World War II mainly include defensive democratic theor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transit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heor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as an “academic project”.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research on democratic theory lacks the ability to set agendas and treats Western “political project” as “academic project”. These are mainly manifested that defensive democratic theory is regarded as a classic in political thought, the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follows western transitolog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high-quality case stud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The historical turn of democratic theory research highlights corrections of liberal democratic theory and gives enlightenments to us.

Key words: democratic theory, defensive democratic theory, democratic transition, historical sociology

①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吕磊：《帕特南和被浪漫化的市民社会》，《学海》2012年第6期。

③ 参见释启鹏：《回到摩尔：重拾民主化研究的阶级分析与历史视野》，《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6期。

④ 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